



千載書頁·護持續命—— 專訪中國古籍修復專家杜偉生先生

莊惠茹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編輯

杜偉生（1952.3.11-），古籍文獻修復專家，2012年榮獲中國第4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：古籍修復技藝代表性傳承人，修復界習稱之杜老師。杜老師於1974年3月始任職於北京國家圖書館，跟隨館內修復名家學習古籍修復技術，歷41年與古籍為伍的修復歲月，參與館內敦煌遺書、永樂大典、西夏文獻、四庫全書等大型古籍修復計畫2015年以研究館員身份退休後，接受返聘，迄今仍維持每週5個半天到館協助修復工作、指導實習生，並擔任修復研習班之講師。

一、因緣際會·名家領路

杜老師出生於北京，家族是道道地地的老北京。17歲那年入伍當了建築工程兵，5年間隨著部隊開拔南京、安徽、湖南各地；架橋鋪路，修建廠房，1974年3月退伍後被分配至國圖工作，時國圖仍位於故宮附近的北海舊館。憶起當年從舉鋼扛土的烈陽下走入沾漿糊紙的辦公室裡，杜老師笑道：「當時就覺得挺好，終於能坐在屋子裡工作了。」剛入國圖時，杜老師被分配至總務處底下的「圖書修整組」，組內共32人。當年國圖設

有印刷廠，專事館藏期刊、報紙的裝訂，並兼及各式圖書資料裝裱修整工作。杜老師剛入國圖時從事西式書刊的裝訂業務，半年後被派赴北京大學開設的「古籍整理進修班」學習。為期1年的在職進修過程裡，杜老師有機會系統性地接受北大教授傳授各項古籍知識，並學習古籍整理與修復技術。1975年10月回到原單位復職後，開始跟著組內的老師傅們學習書畫裝裱等傳統古籍裝幀技術。

國圖古籍修復專業有其悠久綿長的歷史。該館前身為1909年宣統皇帝御批興建的「京師圖書館」，館藏基礎奠基於宋代以降的歷代皇家藏書，為因應其以善本古籍為主的館藏特色，開館之初即從北京琉璃廠知名之古書店肄文堂、肄雅堂裡，延攬當時的修裱高手蕭氏家族之蕭順華等人入館，專司古籍修復作業。¹此後經年，國圖除禮聘琉璃廠技藝精湛的修復專家到館外，亦指派新進館員跟著老師傅們學習，並延續傳統裝裱技藝的傳承方式，以師徒制的傳藝方式培養館內修復人才。當年杜老師跟著老師傅們學了9個月後，就開始著手進行古籍修復工作。

【館務報導】



二、紙棺面世·新手上路

杜老師至今仍對接手修復的第一件大案子「新疆紙棺」印象深刻。1976年新疆出土的一口「紙棺材」被送到了故宮博物院，這是新疆吐魯番地區自1950年開始進行科學考古發掘後的又一成果。當時吐魯番挖掘出土的墓葬年代多屬西晉至唐中葉時期，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紙棺、紙衣、紙鞋襪及陪葬俑，這些紙製葬器多撕黏當時日常文書寫本製成，故因內容保留了當時人們的生活記錄而倍為珍貴。杜老師和同事們被派赴故宮協助進行「紙棺」的剝揭處理作業。當年那口紙棺上層層糊裹的紙張，是唐代驛站的帳本，歷一千多年的時光，紙張早已深深吸附遺體自然腐敗過程中的血水及氣味，每張紙頁得仔細揭開後再泡水去污處理，杜老師仍清晰記得「泡出來的水都是紅的」；更令人難受的是紙張所散發出來的屍臭味，這讓工作人員得時不時跑出屋外透透氣，緩一緩呼吸。從紙棺上揭下來的紙頁經清洗後還原紙質原貌，發現其用紙和敦煌寫卷一樣，顏色偏黃，結構紮實。當整副紙棺上千片紙頁經小心剝揭下來後，就得進行殘片綴合，復經整理、托裱、上牆繃平、下牆，再逐頁釋讀、綴聯、編排、裝幀成冊，最後共還原出30餘卷帳本，成為珍貴的吐魯番文獻資料。這次「化腐朽為神奇」的經驗讓剛入行的杜老師深刻體會到這個職業的特殊性。

三、修復敦煌·融攝創新

1980年國圖進行組織改造，原隸於總務處的圖書修整組劃歸為善本特藏部，並於1987年從天津街舊館搬到魏公村新館現址，就在那一年，

杜老師成為圖書修整組組長。當時，國圖擬啟動對館藏1萬6千件「敦煌遺書」的修復工作。國圖所藏敦煌遺書來自1910年敦煌藏經洞的移交，並陸續續又從其他單位徵集入館，該館敦煌文獻館藏量佔世存總量之四分之一。由於敦煌文獻有大量的手卷，故早期師傅們所採用的修復方法，乃按中國傳統字畫裝裱法中的手卷裝裱法進行裝裱，手卷裝裱中常見的天頭、隔水、迎首等一應俱全，在當時看來一幅幅裝幀完成的卷軸漂亮細緻，作工堪稱精良。1987年敦煌修復計畫啟動前2年，國圖曾於1985年前後針對個別受損的敦煌卷子進行嘗試性修復，當年舊有將手卷改為卷軸裝的作法隨著修復觀念的進步，開始受到挑戰。

早期修復古籍講究修補到「天衣無縫」，盡善盡美，修復後的原件看不出修補的痕跡。1985年的嘗試性修復一開始仍採用傳統手卷裝裱的方式，當時為使紙質結構厚薄不一的手卷原件平整漂亮以利於裝裱，對其進行搓薄處理，具體做法是將手指沾水從卷子背面原件較厚處，逐一搓薄後再整卷托裱。處理過程中時任善本特藏部主任的李致忠先生，以及前來參訪的大英博物館修復人員看了皆覺不妥，主要是搓薄的動作改變了原件的紙張性質，且原件經搓薄後再整卷托裱，更是直接改變了其珍貴的歷史原貌，使後人檢視原件時，再也無法清楚這批文件的原始裝幀與紙質特性。幾經考量與討論，杜老師覺得館方當時對修復敦煌文獻的技術及方法皆未成熟，「時機不成熟，寧可不動」，故建議暫緩修復計畫，待修復技術與知識皆健全成熟了再重啟計畫不遲；此建議最後獲得了館方的支持。

1990年，杜老師以交流學者身份受邀赴大英圖書館東方部參訪半年，協助該館修復其典藏之

敦煌文獻。此次邀訪是大英圖書館為即將於1994年設立的國際敦煌項目（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, IDP）所做之準備。大英圖書館館藏之敦煌文獻共2萬件，該館於1970年曾對之進行修復，當時將原件破損處以蠶絲網加固，並調合變性澱粉製成的漿糊修補，但幾年後發現當年使用的漿糊變硬了反而不利保存。再者，當時採用日式裝裱方式，於原件四周進行鑲邊，雖無整件托裱能較大程度保留紙質原貌，但鑲邊後的手卷卻也非其原始樣貌。總結過往的修復經驗，融攝創新的修復技術與理念，當杜老師1990年赴英時，大英圖書館的敦煌修復方式已大有不同。他們組成修復工作團隊，於作業前先對原件之修復方式進行深度討論，選擇對保存原件最有利的修復方式，修復過程中藉由實踐結果不斷修正修復方式，並將修復過程記錄下來。所謂最有利修復，就是得設法最大程度地保留古籍原貌，並儘可能保留前人修復的歷史痕跡，讓文件所歷經的每段保存與修復歷程能隨時間的積累永久保存下來。再者，所使用的修補材料及修復方式都必須是可逆的。故大英的修復作業不講究快速，而是講究最適、精緻、細膩、可逆，且修復與研究同時進行，當一件作品修復完畢後，同時達到修復技術提昇、經驗積累與相關知識傳遞等積極目的。

在大英圖書館的半年間，杜老師吸收該館的修復理念，學習該館的修復方式，著手整理了其館藏編號8450號以後的5,000多冊敦煌遺書，並在該館見識到可一次補滿一整張書頁破洞的「紙漿補洞機」。²回國後，總結前輩及赴英習得的修復經驗，杜老師帶領國圖圖書修整組於1991年3月重啟敦煌文獻修復。這次修復作業訂立了三大原則，此三大原則日後成為國圖修復作業之基本準則：

1. 整舊如舊：在能提供文件充足保存條件下，儘可能保持文件修復前的歷史原貌，亦即在修復過程中最大程度保留文件遞遭過程中的種種歷史痕跡，包括歷來的修復記錄，而非企圖恢復文件原始未損壞前的原貌，更不可在修復的過程中改變文件的原始樣貌。
2. 局部修補，最小干預：只針對破損處使用薄皮紙一層一層地貼補使達原紙厚度，不搓薄原件，亦不整張托裱、上牆乾燥。一般而言，敦煌手卷破損處多補至第三層即可達原件厚度，層層補紙時需留意漿口要逐漸縮小以避免與補紙與原件交疊處過厚。另外每層補紙都需拉出纖維搭接在原件或其後的每層補紙上，以利美觀。手卷上下兩邊的裂口亦需修補，若上下邊緣已鬆脆，則於裂口修補後，再以長條補紙加固。
3. 可逆性修復：所有修復過程都必須是可逆轉的，亦即使用之修復材料及步驟不能對原件造成傷害或改變，所有的修復行為皆可使原件還原至未修復前狀態。修補材料必須是可被揭除的，將來如有必要，隨時可清除過往修復，以更好的技術與材料提供文件更好的保護。

四、永樂大典·原裝掏補

2002年國圖開始修復館藏161冊的《永樂大典》。成書於明代永樂年間的《永樂大典》使用的是當時慣用的包背裝，裝幀方式是將書頁有字的一面朝外沿著版心對折後齊欄撒齊，再於書腦處訂上紙捻，最後扣上書皮。由於該館所藏之161冊為四處徵集所得，破損程度不一，其中還有戰亂時被蘇聯帶走後被改裝的數十本，故修補首要就是將改易裝幀者恢復原狀，並對損壞處一一修



補。有了科學修復敦煌文獻的經驗，此次開展的《永樂大典》修復作業對修復材料的選用要求更高了。在修復用紙的選擇上，因對坊間可尋得的補紙皆不是很滿意，最後採用國圖收藏的一批清代早期「高麗紙」古紙作為修復材料，開啟以文物修補文物的特殊現象。另《永樂大典》的書皮於紙質外覆有一層絲織品，材質接近生絲，為修補書皮達「修舊如舊」程度，修復同仁跑遍北京傳統布行，努力尋找材質與之相近的生絲，最終在百年老字號「瑞蚨祥布料店」裡尋得可用材料。有別於一般線裝書修復時多是剪開縫線、拆除紙捻、移除書皮後將書頁逐頁攤平，從背後進行破損修補後再還原裝幀；因《永樂大典》保有明代珍貴的皇家包背原裝，修復組決定修復時不拆開原始裝幀，但書皮、紙捻若不拆除，在書頁無法取出的情況下，則修補書頁中間的破損很是考驗修復技術。杜老師據此採用了高難度的「掏補」修復方式，持工具慢慢的伸進書頁破損處，一點一點「掏」著修補。在原裝書上進行「掏補」時，由於書頁前後頁相挨，故修復時要非常仔細，得注意不能損害到其他書頁，且每修復完一頁，需將之壓平乾燥後再繼續修補下一頁，修復進度相當緩慢。透過歷來幾批重點典籍的大規模修復作業啟動，修復作業也從早期的天衣無縫、手快量大轉變成如今的量小質精、慢工細活。

五、修復歲月·悠然自得

近年來，中國對古籍保存與修復逐漸重視，除了大專院校相繼成立相關系所外學程，國家級的古籍保存中心亦紛紛成立。2007年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於國圖成立，負責大陸地區古籍普查、古

籍修復人才培訓等業務，杜老師成為各級古籍修復培訓班的主力師資，常奔波於各省傳藝授業，並於2012年成為中國第4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古籍修復技藝代表性傳承人。³2015年杜老師於工作41年的崗位上退休，旋即被返聘回任，每天到館半天，從事教學及修復指導工作。筆者2016年8月到訪國圖時，杜老師正悉心指導著一群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「文物與博物館碩士教育中心」，進行暑期實習的研究生，杜老師讓他們從中國各式古籍裝幀實作開始，逐步熟悉各式裝幀原理，並實際整理一批友館請求國圖協助整理之民國線裝書。

細數在國圖的歲月，人生數十載精華就在日日夜夜的修復作業中悠悠度過。當年因緣際會入行，有機會跟隨技高藝巧的大師們學習，復因自身興趣與對工作的責任感，深入修復領域，精進技藝，在經手無數古籍後，對壽長千年的古籍愈是敬畏與寶愛，費心思量，努力尋找並發展出最適切之修復方式，使其延年益壽，千載長存。杜老師在職期間有3次派赴大英圖書館、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機會，除了協助各館進行中式古籍修復外，並藉此學習各式西式裝幀技巧，見識到西方科學修復與保存技術的發展，促使其有機會融會貫通中西裝幀特性，截長補短，援益於日後的古籍修復中。對於外界尊稱其為修復大師，杜老師謙虛的說「古籍修復工作，自己說補得有多好是假的，只有150年乃至更久遠後，我修補過的書有機會被他人拿起，於細細檢視後讚道『補得真好』，那才是真的。」而一本書要被讚嘆補得真好杜老師認為其實「技術不複雜，只是做法不容易」，需要大量經驗的累積，這行靠的就是「三分技術，七分經驗」。對於有心走入這行的年輕

人，杜老師鼓勵道「只要有紙在，這一行就有存在的必要，所以我們這一行，路雖然窄，但是比任何行業都長。」不用擔心出路的問題，只要安穩自己的心志，確定喜歡這一行，靜下心來，好好學習，輔以大量實作，就能悠遊其中，尋得箇中況味。

註釋

1. 北京琉璃廠自乾隆年間即為京城地區古玩字畫、珍本古籍、文房四寶之薈集之地，各古書店因應字畫買賣之需求，亦培養了一批精於書畫裝裱、古籍修復的高手，其中尤以來自河北省衡水市的蕭氏家族最為知名，薪火相傳，門

徒眾多。至今北京地區各大博物館、圖書館之修復部門皆傳承自蕭氏技藝一脈。杜老師入館時修復組的組長蕭振邦及其兄弟蕭振堂皆蕭氏後輩。

2. 1993年，杜老師和同事參考「紙漿補洞機」的原理，成功製造了一臺適合中國紙張特點的「紙漿補洞機」，該補洞機特別適合施用於蟲蛀嚴重的書頁，如國圖館藏蟲嚙嚴重之《賦役全書》共有數百冊，平均每冊80頁，投以補洞機處理，平均一天可補40頁，成效卓著。該項發明並於1998獲頒中國文化部科學進步獎。
3. 面對這樣的榮譽杜老師顯得淡然，他覺得人們該思考是否因為古籍修復技藝已趨式微，才需要列名重視傳承呢？



杜偉生老師（立者）正指導社科院文博中心研究生古籍裝幀實作